

【书林清话文库】

二余斋说书

刘尚恒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书林清话文库

主编 傅璇琮 徐雁



二余斋说书

刘尚恒 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二馥斋说书/刘尚恒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4.12

(书林清话文库/傅璇琮, 徐雁主编)

ISBN 7-5434-5658-3

I. 二… II. 刘… III. 图书保护-文集
IV. G253.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130614号

出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hbep.com>
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, 050061)

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

印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16

印张 18

字数 285千字

版次 2004年12月第1版

印次 2005年5月第2次印刷

书号 ISBN 7-5434-5658-3/G·3672

定价 29.9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志伟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。0311—8641271, 8641274

邮购地址: 050061, 石家庄市联盟路707号中化大厦1101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

邮购电话: 0311—7731224 E-mail: wfbbooksell@vip.163.com

从《学林漫录》丛刊 到《书林清话文库》

(代序)

傅璇琮

我于1951年秋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求学，至1952年8月，随我国高等院校系大调整而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三年后毕业留校，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“宋元明清文学史”课的助教。本以为就此可以在大学教学和科研的坦途上前进，不料在1958年年初，因所谓的“同人刊物”问题，与乐黛云、褚斌杰、裴斐和金开诚等人一起被诬为“右派集团”而身心俱受打击。

1958年3月，我从北京大学被贬逐至商务印书馆。我在北大是教书，只不过三四年，而且那时只是个助教，跑腿儿的机会多，真正上堂讲课不过少数几次；到出版社是编书，倒是每天与书打交道了（当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有几年除外），编书生涯占去了一生中的大半辈子。但现在稍稍作一些回顾，编出的书真能惬意的，却也似乎不多。能说得过去的，我觉得只有《学林漫录》丛刊那一种。

到“商务”那会儿，也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，但自我感觉似乎已入“中年”。那时“商务”在北总布胡同10号，由几个四合院组成，都是平房。

我所在的古籍编辑室，正好是在北屋西头，面对的是一个颇为典雅幽静的小院子。室主任吴泽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龙旧编的基础上重编《越缦堂读书记》，他可能觉得需要一个帮手，也或许看到我刚从大学出来，得收收心，就叫我帮他做这件事。

步骤是将由云龙的旧编断句改成新式标点，并再从李越缦的日记中补辑旧编所遗漏的部分。李慈铭也可以算是我的乡先辈，大学念书时读《萼海花》，对书中所写的他那种故作清高的名士派头感到可笑，但对他的认识也仅此而

已，现在是把读他的日记当作一件正经工作来做了，对这位近代中国士大夫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坎坷遭遇了解稍多，竟不免产生某种同情。我虽然头上已戴了“帽子”，但那时对脑子里的“东西”却似乎还拘查得不严。

我是住集体宿舍的，住所就在办公室后面一排较矮的平房里，起居十分方便。一下班，许多有家的人都走了，我就搬出一张藤椅，坐在廊下，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、月季之类，就着斜阳余晖，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《越缦堂日记》，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，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、史、子、集的各类杂书，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，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，真有陶渊明“时还读我书”的韵味，差一点儿忘记了自己的“罪人”身份。

但好景不长，1958年7月，由于几个老牌出版社“专业分工”的确定，我又被调转至中华书局。随即转入纷繁的编书生涯，“商务”那段短暂而悠闲的生活结束了，从此，“此情可待成追忆”（李商隐《锦瑟》语）了。

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告诫我：“你就在工作中好好改造吧，安心看稿。”他是懂得爱惜专业人才的，并不让我去“下放劳动”，而是把我圈在作者的书稿中，专致于编辑业务。我为审读有关书稿，就上自《诗经》下至《人境庐集外诗》地翻阅了不少书。我在《当代学者自选文库·傅璇琮卷》（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）的序中有过回忆：

按照我当时的政治处境，是不能写文章往外发表的。于是我白天审读、加工稿件，晚上看我要看的书。当时我处理陈友琴先生的《白居易诗评述汇编》，我提议由中华书局搞一套“中国古典作家研究资料汇编”，领导同意这一方案，于是把陈先生的这部书改名为《中国古典作家研究资料汇编·白居易卷》……我自己就搞《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》和《杨万里范成大卷》。

我平时从中华书局图书馆借书，夜间翻阅。每逢星期天，则到天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，中午把早晨所带的馒头伴着图书馆供应的开水当一顿午饭。我的近二十万字的《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》和七十余万字的《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》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出来的，这也就是我真正做研究工作的起点。我没有荒废时间。

我那时就想尝试一下，在出版部门长期当编辑，虽为他人审稿、编书，当也能成为一个研究者。我们要为编辑争气，树立信心：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，编辑是能成为专家学者的。

应当说，中华书局三十年的工作，打下了我做学问的底子。我始终对这个环境是有感情的。我在《唐代诗人丛考》（中华书局1980年1月初版，2003年5月重印）的“重印题记”中说过：“我在编辑工作中学到了那时大学环境中学不到的许多实在学问，这也得力于中华书局在学术界的特殊位置。但后来却又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、欺凌，以及因所谓世态炎凉而致的落井下石的遭遇。但我这个人毕竟是个书生，从50年代起，不管环境如何，总是抓紧时间读书作文。”

不过，头几年的事务也确实丛杂得够呛。

刚到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，即碰到新编唐诗三百首之事。在1958年的大浪潮中，对古人一切都要推倒重来，说是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的《唐诗三百首》“美化封建社会”，对今天的读者毒素很大，我们要新编一本来加以“消毒”。新编当然无可厚非，问题是依据什么“标准”。既然反旧编之道而行之，旧编“美化封建”，我们现在就要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。于是以民间作品为主，把相传为黄巢的“反诗”以及民歌民谣优先选入，再收白居易、杜荀鹤等所谓反映“民生疾苦”的作品。

编辑室内屡次为某些作品入选与否争来争去，编辑室一位副主任，可称“三八式”干部，后来总结这次新编的工作，认为自始至终贯串“两条路线”的斗争，无疑是把我和其他几位列入错误路线中去的。她解放前曾在邓拓手下做过事，有老交情，于是请邓拓当顾问，这本“新编”的前言即出于邓拓之手。当时大家都洋洋自得，认为牌子硬。

殊不料“福兮祸所伏”，1966年上半年批“三家村”时，把《新编唐诗三百首》也揭发出来了，说是邓拓借选诗，把唐诗中描写黑暗的作品大量选入，是借此攻击“大跃进”、“总路线”，把一个好端端的新中国搞得暗无天日、一塌糊涂。

那时我还在河南安阳农村搞“四清”，春夜静寂时，读到《人民日报》上的这一揭发批判文章，真是惊得目瞪口呆。因为我是参与者，明明白白知道诗是编辑室内的人选的，只不过选成后邓拓看看，怎么忽而变成是邓拓选的了，而且是邓拓借此而作为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”了！安阳是殷墟的旧地，甲骨文是我们文明的老祖宗，我倚伏于中原大地上一个农家的昏微灯光下，面对着这篇“檄文”，真感慨于我们古老的历史传统中一种可怕阴森的东西。

《新编唐诗三百首》工作于1958年10月间结束，随即转入杂务。记得我刚进中华书局时，一位编辑室主任曾给我一部明季抗清的文臣写的文稿《邢襄奏稿》和《枢垣初刻》，叫我写一篇“出版说明”；后来还经手过顾颉刚先

生标点的清人姚际恒的《诗经通论》；第三部是《顾亭林诗文集》，除了通阅、标点外，还要各写数千字的有评析的说明文字。1958年至1959年间文教战线“拔白旗、插红旗”，北大中文系师生编了一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，编辑室领导又命我做该书的责任编辑。而自60年代初期起，我又参加“二十四史”的校点。这样的一种上下千余年的工作，对于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的人来说，也可以说是一种“锻炼”，但它们对于我也是一种事业上的兴趣，并不只是作为一种“任务”，我在理智上觉得应当把它做好。

而对于《学林漫录》，则完全是出于一种趣味上的爱好。1979年至1980年间，我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。由于工作关系，我在古典文学界之外，又结识了历史学界不少老年和中年学者，交友面比过去稍广了。我感到史学界的研究者，专业性似乎比古典文学界为强，对学术课题钻研较深，但他们与古典文学界中一些朋友一样，大多希望在专业范围之外，浏览一些虽然也是学术问题却比较轻松的漫谈式的文章。这时，我正好从朋友处看到香港出版的《艺林丛录》，受到启发，觉得不妨也编这样一种不定期的学术小品集。这正是《学林漫录》初集“编者的话”所说的缘起：

不少文史研究者或爱好者，愿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，就平素所感兴趣的问题，以随意漫谈的形式，谈一些意见，抒发一些感想。而不少读者，也希望除了专门论著之外，还可读到学术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相结合的作品，小而言之，可资谈助，大而言之，也可以扩大知识面，开阔人们的眼界，启发人们的思想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。《学林漫录》的出版，正是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。

至于编选的宗旨，仍用“编者的话”说便是：

《学林漫录》的编辑，拟着重于“学”和“漫”。所谓“学”，就是说，要有一定的学术性，要有一得之见，言之有物，不是人云亦云，泛泛而谈，如顾炎武所说的“废铜”。所谓“漫”，就是上面说过的不拘一格的风格与笔调。杜甫在他定居于成都时，写了一首《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》的七律，有这样两句：“老去诗篇浑漫与，春来花鸟莫深愁。”是很有意义的。杜甫在他后期，诗律是愈来愈细了，但自己却说是“漫与”，似乎是说诗写得没那么经心了。这是不是谦词呢？不是。老杜经历了大半生的戎马战乱，在离乱的生活

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，稍有闲暇，又读了不少书，只有在这样的深厚的基础上，才能写出“浑漫与”三字，就是说，看来不经心，其实正是同一篇诗中所说的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。拿杜甫这首诗中的诗句，来为我们这本书的“漫”字作注脚，恐怕是合适的。

《学林漫录》第一集出版于1980年6月。这一集是我一个人编的，筹备了大约半年，向一些文史界相识师友组稿。先是向我素所敬仰的启功先生索文，他欣然先写两篇，一是《记齐白石先生轶事》，一是《坚净居题跋》。启功先生的这两篇可以说是代表《学林漫录》的两大部分内容，就是记述近代有建树的学者、作家、艺术家事迹的文章，以及包括各种内容的学术小品。这在当时，对不少读者来说，都有一种新鲜感，因此，颇受文史界以及其他行业中人的欢迎。正如第三集的“编者的话”所说：

读者欢迎已出的初集和二集，大约就在它的别具一格吧。所谓别具一格，从内容上说，就是所收文章的面较宽。举凡近当代一些学者、作家、艺术家事迹的记述，诗文书画的考析和鉴赏，古今著作的推荐和评论，以及读书随笔、序跋札记，只要有一得之见，言之有物，均可登载。另外，从文章的风格上，我们主张不摆架子，不作姿态，希望如友朋之间，促膝交谈，海阔天空，不受拘束。

初集问世以后，我因其他事忙，就约了古代史编辑室的张忱石和文学史编辑室的许逸民两位合编。他们当时还不太忙，三人共同商量，事情就好办得多。《学林漫录》刊登学者、作家、艺术家的事迹，在当时为其他刊物所少见，而约请的写作者一般都是这些学者、作家、艺术家们的朋友、学生或亲属，亲炙日久，了解自深，行文又自然、真挚，读来使人倍感亲切。这是《学林漫录》的一大特色。前后所记述的有齐白石、陈寅恪、张元济、朱自清、陈垣、黄侃、邓之诚等四十几位人物。

《学林漫录》的文章一般只不过两三千字，是希望不要给读者以过重的阅读负担。有的还仅数百字，如俞平伯先生的《德译本〈浮生六记〉序》（第八集）和钱仲联先生的《重修破山寺碑记》（第十二集）。前者是吴小如先生约来的，后者是许逸民同志和我有一次与钱先生一起开会，钱先生随便谈起时向他约的。两篇都用文言写：俞先生的序潇洒清脱，一如晚明风格；钱先生的记则奥义丽辞，直追六朝译经。

但《学林漫录》所收也有长文章，一是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钱伯城。一次我到上海去，他说他写了老画家颜文梁先生年谱，几万字，当时哪家刊物都不能登，颜先生虽然无论人品画品都可称为近代中国油画界的开拓者，但人老了，知道的人不多了，实在遗憾得很。我遂以不拘一格为由向张、许两位推荐，在第六集一次性刊出。想要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油画的发展，此文是非读不可的。

另一长篇是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的《京剧老生流派综述》。这是吴先生的旧作，比钱伯城同志所作的年谱更长，从谭鑫培一直说到周信芳，共八篇，总计超过十万字。这样当然不可能一集刊完，于是与小如先生商定，每集刊两篇。本以为这样的专门记述不易为众人所注意，却不想引起轰动效应，不但像启功先生那样的大学者赞不绝口，据我的大学同窗白化文介绍，北大一位化学系教师，每集必捧读吴先生的这一长篇连载，寝食俱废。更怪的是，据他说，有一位肺癌晚期的在我国工程技术界颇有建树的长者，于平静的回光返照中，对自己的一生是满意的，别无眷恋，只惦记着要看看吴先生对马连良的评议最后究竟如何（《读〈学林漫录〉》，见《书品》1987年第四期）。

我们几个人还立了一个规矩，那就是从初集起，每一集的“学林漫录”四字，都分别约请一些学者或书法家书写，这样集合起来不啻是当代名人书迹，不但有观赏价值，还有文献价值。初集由我约了钱钟书先生题签，以后几集则是下列诸位先生：启功、顾廷龙、叶圣陶、邹梦禅、黄苗子、许德珩、许姬传、张伯驹、李一氓、赵朴初、王遽常、任继愈等，这也是别具一格之处。封面设计也是一贯的素雅沉静的风格。

自从1980年6月出版《学林漫录》初集以后，就进度和印数来说，可以说每况愈下，特别是在1988年出现了大滑坡。我曾就各集作了一个统计，初集1980年出，印了三万多册；第二、三、四集是1981年出，第五、六集是1982年出，第七、八集是1983年出，第九集是1984年出，这几集印数都在一万数千册。1985年倒也出了两集（第十集、十一集），印数已跌进一万以内了。而1985年以后，1986、1987两年都是空档，1988年1月才出了第十二集，印数只有两千五百册。

这当然要亏本，出版部的同志不热心，经营管理的同志也提了意见。而相识的朋友，包括不少作者，是仍然很关心的，见到必问有新的出来否？有的开玩笑地说：《学林漫录》的“漫”应该改为“慢”了。

结果第十三集于1991年5月出版，印一千册；八年后出版了第十四集，印四千册。后来又把它们集合起来，换了封面重印过一次。中华书局拟陆续新

编，但恐怕不可能每年都编辑新集了。

在编辑《学林漫录》的过程中，我对于那些谈书人书事的文章就十分有兴趣，先后主张刊登过《傻公子的“傻贡献”——嘉业堂藏书楼的过去和现在》（许寅）和《书林琐记》（雷梦水）等，但毕竟侧重点不同，所用文章有限。多年前，在编纂《中国藏书通史》问世以后，曾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4届毕业，到南京大学工作后曾经有过多次学术合作的徐雁教授谈及，在此领域尚有文章可做。他表示即可筹划一套《书林清话文库》，大可裨补学坛，沾溉书林。我以为文库的立意颇佳，有关各书的选题，如韦力先生的《书楼寻踪》、曹培根先生的《书乡漫录》、孟昭晋先生的《书目与书评》、刘尚恒先生的《二馥斋说书》、谢灼华先生的《蓝村读书录》、周岩先生的《我与中国书店》以及来新夏先生的《邃谷书缘》、徐雁先生的《苍茫书城》、虎闾先生的《旧书鬼闲话》、林公武先生的《夜趣斋读书录》、胡应麟等的《旧书业的郁闷》、范笑我先生的《笑我贩书续编》，都极有文献价值和文化涵义。

按20世纪初叶德辉曾著有《书林清话》一书，以笔记体裁记叙古代版刻、藏书情况，多有专门知识性的掌故。但他未说及何以名为“清话”。按陶渊明有诗云：“信宿酬清话，益复知为亲。”（《与殷晋安别》）他与挚友临别，可以连续两夜（信宿）谈话，即清雅不拘世俗之交谈，故更为亲切。又“建安七子”之一刘楨有“清谈同日夕，情眇叙忧勤”（《赠五官中郎将》之二，《文选》卷二十三）；东晋时名士殷浩因事离开京都，宰相王导特约其共叙：“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。”于是，“既共清言，遂达三更”（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）。可见清话、清谈、清言，都有情深思切、朝夕细叙之意。我想，读者披览这套文库，也必有此感。我读韦力先生之《书楼寻踪》、周岩先生之《我与中国书店》，既有一种沧桑之感，更有对书林的缅怀之情。现在在邓子平先生的倾力支持下，经过两年多的组稿，基本形成了如今的格局。来自各地的作者们的书稿，尽管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，但他们钟爱书籍文化、探究古今图书的学术趣味却是共同的，想读者必会有“交酌林下，清言究微”（陶渊明《扇上画赞》）之趣。

《书林清话文库》即将付梓，按例不能无序，但又苦于事冗少闲，商诸徐雁君，徐君嘱以缀合旧文以为“代序”之法。四五年前，河北教育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我著述的两种书，如今又将印行本套文库，可见其赞襄学术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。我谨致以谢忱。

2004年10月于北京西城六里桥寓舍

自序

本书名为《二馥斋说书》，盖作者供职公共图书馆，一生为读者访书、买书、分编书、管理书、取书、查书，手之所触，眼之所见，心之所想，口之所说，无非是书，一辈子在苍莽的书林里，寻寻觅觅，搜索着，探险着，希冀发现一束诱人的知识阳光。

书林中自然是羊肠小径，迂回曲折，鲜花之外也还有丛生的荆棘、缠人的蔓藤。然而不论如何艰险，劳苦困顿，几十年来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。

书籍作为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物质和精神的结晶、记录和传递知识的载体，是人们继往开来的凭借、推动着历史发展的永恒动力。对于这一人类社会精灵中之精灵，古往今来的先贤圣哲论之多矣、详矣、精

矣。以书为伴，相守一世，亦人生之幸事、美事：守着这些精灵，耳濡目染，能不多少沾上一点儿灵光仙气吗？

《二馥斋说书》分为四辑：曰书话，书人，书事，书味。

说到书，我的话也就多起来了。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，至今流传下来的书籍，一向被人喻为“浩如烟海”、“汗牛充栋”。其数量之多、门类之繁、涵盖之广，令人叹为观止。这自然是我们文明古国最具体、最形象、最生动的证明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无法企及的，是我们国家的骄傲、民族的荣光。

面对历尽沧桑而保存下来的书籍，我们怎能忘记历史上公私藏书家们的丰功伟绩呢？

为了聚书，他们“清俸买来手自校”，“黄金散尽为收书”；为了使残圭断璧得以延津之合，浦合珠还，他们荒摊冷肆，经年求索；为了保存好书，他们修补整饰，选址造楼，立橱上架，千方百计地防止水火兵虫的侵害；为了消除书籍中错脱衍误、鲁鱼豕亥之类，他们焚膏继晷，兀兀穷年，把卷勘校，目为之眈，体为之羸；他们藏书处的命名和钤在书上的印鉴，不仅流露自己的家世、身世、志趣、情操，更把自己对书的特殊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他们自称“书淫”、“书痴”、“书癖”、“书魔”，把书当做充饥的美食、御寒的裘衣、解忧的音乐、孤寂时的良朋、治病的良药，淡泊终生，读书、著书、编刊书，为传承民族文化默默地奉献着。

清代中期杭州有个藏书家叫何元锡，他有一方别具风韵的藏印：“布衣暖，菜根香，诗书滋味长。”正是这种情怀，支撑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当坐拥书城时，他们竟发出“何假南面百城”的狂言；当书籍散失时，又产生“挥泪对宫娥”的哀音。两千年来，朝代更替，兴废不常，时聚时

散，时散时聚，岂是“天数”为然？实在是蕴藏着时代的悲欢。

显然，藏书文化在中华文化学术史上的作用，是其他文化无法替代的。这就是近年来，它成为传统文化研究中热点的原因所在吧？

在图书馆界里，有句很流行的话：叫做“读报读题，读书读皮”（有人戏称“书皮学”）。尽管每日每时和书打交道，却很少有机会去读它，知道的多限于书皮上的书名、著者、出版社之类（即所谓“文献外部特征”），至于它的内容，则不甚了了，甚至根本不清楚。身在尘世中，难逃五行外，我也基本属于这类人。

为人作嫁，金针度人，固然是图书馆人应该始终提倡的奉献精神（其实任何一个工种，都是在为社会作奉献），然而技艺不精，何以作嫁？金针锈钝，何以度人？

古人说，不通一经不能治经，不通一史不能治史。《十三经》我通何经？《二十四史》我通何史？虽常有涂鸦文字见于报刊，那不过是东鳞西爪，拾人之所弃，或者说，如同卖冰糖葫芦那样的小本经营者。

——充其量我只能算个学术界

的散兵游勇而已。

我的书房称“二馥斋”。此“二馥”并非节取古人的“三馥”。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云，董遇读书以“冬者，岁之馥；夜者，日之馥；阴雨者，时之馥也”。而我之“二馥”，乃谓读书治学皆在公务之馥、家务之馥。

作为图书馆人，八小时坐班，甚至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，忙忙碌碌，琐琐碎碎。老伴则是一个多年划不清“病”与“非病”界限的体弱之人，而以此等工薪阶层的人，请不起保姆，家务还要协助老伴干，至于读书、治学，那只能在这二者之馥了。

我并非清心寡欲之人，然而确于唱歌跳舞不会，麻将扑克不沾，连最流行的电视也基本不看，甚至除夕联欢晚会节目也可舍去，所谓“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立志时”。但是我也从无“名登龙虎榜，身临凤凰池”的奢望，我只不过是自己留下点儿人生轨迹而已。

若干年前，我曾撰文说：图书馆人（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人）要想出成果，不消说写书，就连写一篇像样的文章，没有自讨苦吃的精神，没有拿出超过常人十倍、百倍的毅力，那也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同时我又说过，图书馆人一是守着书，二是每天接触那么多读者，包括各门类专家学人，那是我们的老师。有书，有老师，又何愁做不成学问呢？而这两点，又是其他行业无法企及的。因此，扬长避短，出神入化，全在乎运用之妙，而关键在于是否“有心”。

胡道静先生尝为我赠言，有云“嗜典籍若慕少艾，贪文史无输蚖蚘”。这当然是勉励、鞭策。而我自己则戏曰：“其为人也，貌不扬，语不惊，惟好书如人之好色，贪学如人之贪财，他何知之？”

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，是我多年在书林里寻觅所得的一些果实，是甜，是酸，是苦，或者什么味道也没有，那只能由读者品尝后评说了。我这里得首先感谢傅璇琮先生、邓子平先生，以及向我组稿的徐雁学弟和《书林清话文库》编委会诸君给予的鼓励和支持，在万难中让它有一个面世的机会。倘蒙大雅方家不吝教我，则幸莫大焉。

书此以为序。

刘尚恒

甲申春节于津门二馥斋

目 录

自 序	1
-----------	---

书 话

《读书敏求记》辨证两题	1
《儒林外史》人物本事补考	6
黄钺和他的《于湖竹枝词》	9
罗愿和他的《新安志》	13
万历《天一阁书目》的发现	19
我国首部烟火专著《火戏略》	25
“津门竹枝词”的掌故	28
关于顾千里的《邗水杂诗》	30
《清代学术概论》的由来	34
《藏书纪事诗附补正》	37
《中国农学书录》补正	42
《皖人书录》	47
《清代硃卷集成》出版感言	50
《清代版刻一隅》	52
《钱亚新集》	55
《寻根集》	58
《中国丛书广录》	62
《明代刊工姓名索引》	67
孤本古籍丛书提要	71

书 人

陈寅恪珍藏“红豆”的因缘	80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《桃花扇》始刻者佟蔗村	83
安麓村身世之谜	86
安氏所刊《书谱》始末	90
入赘南京的安徽诗人朱草衣	94
倪模和他的藏书	98
萧穆和他的藏书	105
缪荃孙创办“两京图书馆”	114
胡适关心家乡修志	119
饮冰室藏书的归宿	124
图书馆学者蒋元卿先生事略	127
中国历史上的“书贾”	135
《安徽藏书家传略》后语	143

书 事

中国藏书文化之三昧	148
“黄金散尽为收书”	154
一场关于藏书流通的论争	157
藏书流通与否的不同效果	160
宋刻两《汉书》的流传故事	165
“难寻几世好书人”	170
徽州私家藏书的特色	174
天都陈氏承雅堂藏书	181
说室名斋号	184
私家藏书印鉴的种类	190
私家藏书印鉴的价值	198
“金陵书局”小考	203
胡适《水经注》研究与天津馆藏书	206
津门淘书琐记	209

书 味

杜牧《清明》诗中“杏花村”贵池说	221
两首变性的唐人诗	226
温庭筠的《湖阴词》和芜湖异名	229

欧阳玄与“芜湖八景诗”	232
《牡丹亭》写于芜湖的传说	235
复社中的芜湖文人	238
清初遗民鬻艺价格	242
话说“黄叶村”	245
子牙河得名与姜子牙垂钓	247
桥亭卜卦砚之流传及其真伪	249
芜湖铁画北传天津小考	254
万春圩兴建小史	257
古籍版本学例话	261
独坐书房小天下	268
“前度刘郎今又来”	270

书 话

《读书敏求记》辨证两题

清初江苏常熟藏书家钱曾，从其四千一百余种藏书，中，别择宋元精刻、旧抄以及书之次第完缺，古今不同者，凡六百三十余种，作解题目录，成《读书敏求记》。

这是一部历来被誉为我古籍版本学的重要著述。然而长期以来，关于撰者钱曾与钱谦益的关系，以及该书的传世流行，颇有异说，故特作辨证如下：

钱曾系钱谦益之族

曾孙，非族孙

钱曾字遵王，号也是翁，生于明崇祯二年(1629年)，卒于清康熙四十年(1701年)。他的父亲钱裔肃字嗣美，万历间举人，好藏书，精鉴别，所藏甚富。钱谦益《牧斋有学集》卷三十一《族孙嗣美合葬墓志铭》写道：

从孙嗣美闻风慕悦，亦好聚书，书贾多挾策潜往……子四人：长召，亦举于乡，次名、次曾、次鲁，孙男女二十三人。曾好学能诗，藏书益富。

可见钱曾为裔肃第三子。

钱曾早年随父读书、游历，帮助父亲收藏和整理图书。父亲卒后，随钱谦益读书，并协助收藏、整理图书。钱曾向称钱谦益为“牧翁”，《读书敏求记》屡有所及，而于《敏求记》卷四《高常侍集》跋称：“族祖求赤(钱孙保)又从予转假去。”可见其称谓是不紊的。

然而钱曾谬为钱谦益“族孙”，却是由来已久。清汪森《小方壶存稿·钱遵王招饮城东别业，兼出藏书相示，赋三断句》诗写道：“远访钱王老孙子，欲分万卷恣评论。”此诗写于康熙二十五年(1686年)仲春。此后，清